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所所长 李 林

专家学者·大法官论
推进依法治国
维护公平正义
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三位一体”,它们共同构成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支撑、道路指引和制度保障,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论支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决定》强调要“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提出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全方位占领高校、科研机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阵地,加强法学基础研究,形成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

四中全会《决定》还在其他不同的部分和主题下使用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直接有关的一些概念或者提法,例如: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但决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等等。所有这些表述、提法和要

求,表明四中全会《决定》不仅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有许多新举措新部署,而且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观念更新和理论发展方面有许多新观点新建树。

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基本原理,在借鉴吸收古今中外人类法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从当代中国国情、现代化建设和依法治国的实践出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惨痛教训,逐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继承、创新和重大发展,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理论指导、思想基础和学理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核心要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主要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中国实践为基础的科学理论体系,它由以下主要部分构成。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理论思想体系,涉及政治哲学、法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关范畴和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政党观、民主观、法律观、法治观、人权观、平等观、正义观和权力观,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等;(2)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社会主义法治价值、社会主义宪制和法治原则、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社会

主义法治学说等;(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等;(4)公民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法治态度、法治心理、法治偏好、法治情感、法治认知、法治立场、法治信仰等;(5)关于法和法治的一般原理、价值、功能、原则、学说、方法和知识等的理论。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制度规范理论体系,涉及法治的基本制度、法律规范、法律体系、法治体系、法治程序、法治结构等范畴和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关于国家宪法和宪制理论,如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等)的理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社会制度、基本文化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制度、人权保障制度、立法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等的理论;(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如宪法实施监督体系、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等的理论;(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依法行政和行政执法制度的理论,司法权、司法体制、司法程序、法律监督体制、公正司法制度、依法执政体制等的理论;(4)关于法治的一般制度、体系、程序、规则、规范和架构等的基本原理。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践运行操作理论,涉及法治原理的应用、法治行为、法治实践和法律制度运行等范畴和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法治建设各个环节的理论;(2)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依法治军、依法办事等法治实施各个方面的理论;(3)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经济、法治政治、法治文化等法治发展各个领域的理论;(4)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等依规治党和依法执政的理论;(5)关于法治运行实施的一般规律、特点、机制、行为、方式等的基本理论。

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相关关系理论,涉及法治存在发展的外部关系,涉及法治与若干因素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共同存在等现象及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的关系:(1)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系;(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谐社会、先进文化和生态文明的关系;(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道德、纪律、政策、党内法规、习俗、乡规民约、社会自治规范等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正、安全、秩序、尊严、和谐、权威、平安、幸福等的关系;(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促进发展、维护稳定、构建秩序、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等的关系;(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政党、宗教、以德治国、依规治党、国家治理现代化、良法善治等的关系;(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人类法治文明、西方法学理论、中华法系文明、国际法治理论、全球化法治进程等的关系。

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服务和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直接理论依据,是引领和指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权的重要体现,是构建国家法治软实力、硬实力和巧实力的重要学理支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有利于深刻回答我国法治建设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的重大问题。我国的法治和依法治国,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保证政治文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始终不渝地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正确方向,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依法治国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把党

正解“审执分离”

笔者认为,研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无论是从文字的基本含义还是从体系结构来看,都无法得出“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离就是要推行执行机构脱离人民法院”的结论;从理论上分析,执行机构更是不能脱离人民法院。那种认为“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离就是要实现执行机构脱离人民法院”的观点,不符合《决定》的原意,更与民事执行理论背道而驰。

一、解读《决定》,无法得出执行机构可能脱离人民法院的结论

首先,从文字的基本含义来看。《决定》的原文是“完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可见,《决定》提出的是“审判权”与“执行权”的“两权分离”,而不是“法院”与“执行机构”的“两机构分设”。权力分离强调和追求的是权力的相对独立运行,机构分设强调和追求的则是设立不同的机构分别行使不同的权力。机构分设能够落实权力分离,但是权力分离并不一定要求机构完全分设。典型的例子是立案庭和审判庭都设在人民法院并没有影响立案机构和审判权的分离;反贪、反渎机构和公诉机关都设在人民检察院并没有影响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与公诉权的相对独立运行。那种认为“审判权和执行权分离”意味着“执行机构须脱离人民法院”的观点,既不能在《决定》中找到根据,也不符合《决定》的原意。若按该种观点,我国的国家机关的数量势必无限增多,那显然不符合精简机构的政策走向。

其次,从《决定》的体系结构来看。关于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论述置于“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一节“优化司法职权配置”部分。众所周知,我国的司法职权分别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行使,

执行机构脱离法院违反民事执行基本规律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 谭秋桂

并无其他机关行使司法职权的情况。从有关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论述所处的位置来看,《决定》是将执行权作为司法职权,将执行体制作为司法体制的组成部分来对待的。既然执行权是司法权能,执行体制是司法体制的组成部分,就没有理由将执行机构从人民法院分离出去。由此可见,《决定》并没有将执行权定性为行政权,更没有将执行机构分离出人民法院,将其置于行政机关内部或者将其单列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刑罰执行制度,统一刑罰执行体制”,显然没有将民事裁判、行政裁判等的执行体制与刑罰执行体制相提并论。

再次,《决定》在论述制定强制执行法时,明确将作为民事执行程序“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程序定位为“司法程序”。这就进一步说明,在进行顶层设计上,“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前提和基础是执行权是司法职权、执行体制是司法体制,两权相分离运行是在司法体制的大框架内进行的,属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内容。总之,《决定》并没有将执行机构脱离人民法院的预设意思。

二、民事执行机构脱离法院违反民事执行的基本规律

笔者认为,《决定》提出的“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核心是要实现民事审判权与民事执行权分别按照各自规律相对独立地运行,以“保证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从理论上讲,民事审判权与民事执行权配置的目的和任务各不相同,其具体权能也有所差异。根据各自各自的规律使其分别独立运行,是完全必要的。实现民事审判权与民事执行权的分离,司法公正和执行效率都有了保障,提高司法公信力也就有了保障。一句话,实现

民事审判权与民事执行权的分离运行,是符合规律且完全必要的。

但是,民事执行机构脱离人民法院不符合民事执行权运行规律的要求。首先,如前所述,权力分离与机构分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权力分离并不一定要求机构分设,尤其并不意味着应当分离的权力不能由同一机关行使。其次,作为“单一强制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公权力,民事执行权兼具执行命令、执行裁判和执行实施等多项权能,明显具有复合性。不重视民事执行权的复合性,简单地以其某种具体权能为民事执行权定性,就会犯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而使结论失去可靠性。目前某些人主张民事执行机构应当脱离人民法院,其“重要理由”之一正是民事执行权是行政权而不是司法权。民事执行权的“行政权说”,以偏概全地将执行实施权能作为判断民事执行权性质的基础,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再次,民事执行权的执行命令权能、执行裁判权能和执行实施权能构成一个整体,如果人为地将其割裂开来,民事执行权的配置目的就难以实现,以此为基础构建的制度就会因违反规律而走偏。执行命令权能和执行裁判权能只有法官才能行使,执行机构脱离人民法院,必然产生该两项权能是否随着执行机构脱离人民法院的问题;如果认为该两项权能随着执行机构脱离人民法院,就会产生非法官越位行使法官权力的问题;如果认为该两项权能不随着执行机构脱离人民法院,那么脱离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行使的是不完整的民事执行权,民事执行的效率和效果都将无法保障。

总之,执行机构脱离人民法院,既不是民事审判权与民事执行权相分离的要求,也不符合民事执行权的基本运行规律,是缺乏理论基础的。从世界范围来看,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事执行工作完全

脱离了法院。在大陆法系国家,不动产和债权由法院负责执行,动产多由法院的执行官执行;在英美法系国家,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也是先由法官发出执行命令,然后交专业的执行官或者司法警察(不是治安警察)采取强制性的执行措施迫使债务人履行义务。可以说,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民事执行中的执行命令权能和执行裁判权能牢牢掌握在法官手中,执行实施权能则由司法职业人员行使,完全由与法院无关的行政人员负责民事执行的情况极为罕见。这就进一步证明执行机构脱离法院是不符合民事执行的基本规律的。

三、民事执行机构脱离人民法院弊多利少

改革的基本取向是兴利除弊。在没有绝对的利或弊的情况下,改革应该选择利多弊少的方案。在进行民事执行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如果将执行机构设置到人民法院之外,其结果必然是弊多利少。

首先,执行机构脱离人民法院将引起国家体制的严重混乱,或者严重损害民事执行的效率。如前所述,在民事执行权的权能行使主体问题上,民事执行机构脱离人民法院只有两种可能的方案:一是民事执行权的三项权能全部脱离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之外的机关行使执行命令、执行裁判和执行实施权能;二是民事执行权的实施权能脱离人民法院,另外两项权能保留在人民法院。选择以上两种方案,必然会引起国家执行体制和执行秩序的混乱。这是因为,在执行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形成多种争议,反复需要执行裁判权能发挥作用。如果执行机构不能行使执行裁判权能,这些争议就只能转到具有执行裁判权能的人民法院处理。于是,执行案件在执行机构与人民法院之间来回往返,

执行实施和争议处理的效率都将严重降低。

其次,执行机构脱离人民法院将加重当事人的负担。执行机构脱离人民法院,如果选择前述第一种方案,就可能形成执行机构与审判机关之间的对立关系,尤其是出现民事判决主文不明确、不清晰的情形时,执行机构就可能直接拒绝执行,从而加重当事人的负担;如果选择前述第二种方案,在执行程序中发生的争议都要回到人民法院处理和解决,当事人就不得不在执行机构和人民法院之间来回奔波,从而加重当事人的负担。因此,无论采取何种方案,执行机构一旦脱离人民法院,都将加重当事人的负担。

再次,执行机构脱离人民法院不利于解决目前存在的执行难问题。我国当前存在的执行难问题原因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地方政府干涉执行。如果执行机构脱离人民法院成为行政机关的下属部门,地方政府干涉执行工作将更为“便利”而愈发严重,民事执行工作尤其是被执企业是当地“重点保护企业”、行政机关的执行工作将更加困难。

此外,执行机构脱离人民法院将严重损害司法权威,破坏司法公信力。执行机构脱离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确定的内容能否实现只能依赖其他机关,势必影响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尤其是如果其他机关执行效果不好,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将受到更多的质疑。

总之,执行机构脱离人民法院的结果只能是弊多利少,它不应当成为民事执行体制改革的选项。

加强司法能力建设 落实庭审中心主义

熊春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新时期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宏伟蓝图。而在这其中,庭审在诉讼中的中心地位也得到了突出强调,《决定》指出要“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应然涵义,同时也对法官的司法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庭审中心主义是诉讼规律的必然体现。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广义的诉讼流程主要分为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这样的流程划分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对于案件事实及其法律评价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达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正确裁判。虽然,在我国,无论立案侦查阶段,还是在公诉阶段或者审判阶段,证明标准都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作为案件的最终裁判者,法官应当以更加严格的自我要求来履行法定职责,对于整个案情必须全面掌握,对于相关事实必须准确理解。在庭审过程中,对相关证据要结合双方质证进行“去伪存真”,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具有公信力。对案件事实,要围绕犯罪事实构成要件进行“去粗取精”,使得庭审过程始终围绕定罪量刑,确保诉讼活动保持高度的相关性,不论为无谓的空辩。只有这样,法官才能有效主导庭审流程,始终抓住庭审脉络,从而在庭审过程中形成对于案件事实及其法律评价的正确、深入认识。

庭审中心主义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虽然侦查、起诉阶段已进行了多次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但是,要确保裁判公正,还必须经过控辩双方的对质、辩论。由于庭审是诉讼参与人最为集中的诉讼环节,住往也是控辩双方证据、意见最为充分的交锋过程,而且在定罪量刑中占据着决定性地位。因此,作为司法公正的重要维护者,法官在庭审中必须居中裁判,确保诉辩平衡,落实《决定》要求,“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在控辩双方相互攻防、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过程中,法官要依法维护各方诉讼参与人的各项正当诉讼权利,确保深入查清案情,正确适用法律,使得庭审成为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重要载体,成为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

庭审中心主义是司法公开的有利因素。司法公开的主要对象是人民群众。如果审判以案卷为中心,最重要的困难决策过程都处于“办公室”里,那么,庭审就会沦为形式,人民群众难以从中获取有益的法律知识,感受不到庭审的“对抗性”,久而久之,自然会兴趣递减,而司法公开也将丧失受众。对此,作为司法公开的重要主体,法官必须切实增强庭审驾驭能力,改变“翻卷断案”的固有模式,真正将证据认定、罪名确认、量刑权衡等都放在庭审中,使得庭审过程焕发法律智慧碰撞的火花,具体、形象地展示司法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运作机制,让人民群众能从庭审中汲取到法律营养、感受到司法权威,乐于学法、守法,善于用法、护法,主动参与到依法治国进程中来,从而全面发挥司法公开的功效,真正实现司法为民的宗旨。

(作者系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责任编辑 荆 龙
电子邮箱 llzk@rmfyb.cn